

共绘绚烂民族画卷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作品述评

□纪红建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在题材选择、采访深度、叙事风格、思想表达等方面,呈现出了鲜明特征,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阐释,也展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报告文学是深切地触摸时代脉搏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文体形式,它以贴近现实的温度和扎根大地的深度,成为新时代最为重要而又鲜明的文学表达方式之一。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参评的36部报告文学作品,主题涵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生态文明、模范人物、革命历史等方面,是对新时代全面而深刻的书写。广大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拿起手中的笔,通过身边的人和事,书写民族发展与变迁,共绘绚烂民族画卷。其中,既有“国之大家”,也有“民之小事”,特别是以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张雪云的《“海牛”号》、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等为代表的五部获奖作品,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和风采,是新时代真实、立体、全面的生动呈现。这些不同风格的叙事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阐释,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这些作品在题材选择、采访深度、叙事风格、思想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特征,也是这几年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新成就的重要代表。

第一,题材呈现丰富与多元。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注重对现实及时的反映、报告和表现,精准把握时代的精神特质,彰显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力量,是报告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藏族作家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是一部全面书写西藏全面脱贫的作品,他选取了昌都、日喀则、阿里和噶尔等地理风貌各异的地带为观察点,以西藏近10年驻村工作和脱贫攻坚中的无数个事例,细致书写雪域高原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与辉煌成就。蒙古族作家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将笔尖对准脱贫攻坚一线,记录了蒙古族农牧民妇女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在地方政府,以及以白晶莹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从贫困焦灼的生存状态走向自立新生的感人事迹。侗族作家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切口是贵州的台盘村,这个大山深处名

不见经传的苗寨因一场场“村BA”赛事走红全国,历经艰难脱贫攻坚,如今走在乡村振兴路上,又呈现出新变化、新景象,是新时代广袤乡村大地的一个缩影。苗族女作家张雪云的《“海牛”号》聚焦国之重器——“海牛”号,其科研团队不断创新,攻坚克难,刷新了世界深海海底钻机的钻深纪录,不仅填补了我国海底钻探深度大于100米、具备保压取芯功能的深海海底钻机装备的空白,也标志着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深度”的象征。满族作家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的主人公则是全国“时代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孙景坤,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后毅然回乡并隐姓埋名,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

第二,素材源于大地与心灵。报告文学是使命文学,也是行走的文学。令人感动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纷纷走进生活现场,走进人物内心,进行真切而又深刻的记录与表达。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散发着西藏大地的泥土芬芳。在他近10年驻村工作和脱贫攻坚生活中,只要时间允许,他总会到村里住上几天,与最基层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脚步丈量、用心感受。为采写《让世界看见》,牛海坤深入位于祖国北疆的科尔沁右翼中旗,不仅感受这里的艰苦奋斗、乡村变迁,更是走进草原绣娘的内心,倾听从她们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笑声。采写《“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体现了姚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2022年夏天台盘村的“村BA”火爆后,他就萌生了创作报告文学的想法,随后他深入采访、反复思考,始终在在场者的身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去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芒,找到“破圈”的文化密码。为采写《“海牛”号》,张雪云大量阅读科技和海洋方面的书籍,专程来到海边感受,更是数月跟踪海底岩芯取样钻机“海牛”号首席科学家、“时代楷模”万步炎带领下的“海牛”团队,与他们同吃、同住,深入感受他们工作、生活状态,聆听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故事。为采写《静静的鸭绿江》,周建新数次来到辽宁丹东,徜徉在山城村,行走在老英雄孙景坤曾经走过的路上,

感受着当年老英雄的奋斗足迹,听他女儿讲述着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听邻居们讲述老人的故事,对细节深挖细研。

第三,叙事表达鲜明而生动。报告文学在内容上追求完全的真实,只有真实的故事才能打动人。少数民族作家从最火热的生活现场挖掘到精彩的故事后,运用文学的手法,让故事鲜活并直抵内心。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用驻村工作和脱贫攻坚中的无数个事例,包括异地搬迁、住房改造、现代教育、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的全面实施,也涵盖了人工种草、蔬菜种植、鲑鱼养殖、家庭旅馆、民族工艺、旅游开发等绿色经济模式,细致书写出雪域高原干部群众的艰辛探索、农牧民生活的今昔巨变。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紧紧围绕主人公白晶莹的形象塑造展开描写,不仅写出了一个敢啃硬骨头的共产党员。作品深入到绣娘们的内心,对她们心理和情感的把握特别贴切,人物形象格外丰满动人。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既写了台盘村的前世今生,也通过无数次零距离接触台盘村驻村第一书记、致富能手、返乡创业者、乡村解说员等,寻找“村BA”火爆“出圈”的文化密码,呈现出百姓欢喜、村庄繁荣、国家兴旺的景象。张雪云的《“海牛”号》以万步炎的科研经历和心路历程为主线,讲述“海牛”号科研团队自强不息、不断创新,实现技术超越背后的动人故事,并辅以深海资源开发、中国探索深海的科普知识,全方位、立体展现中国深海钻探的飞跃式发展,展现了以万步炎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的风采。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真切地刻画出一位平凡而伟大、深受老百姓爱戴的英雄形象,他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怕牺牲,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计得失。

第四,思想内涵深刻且辽阔。优秀的报告文学对现实应有全面深刻的揭示,这次获奖的五部报告文学作品在思想内涵上均有探索与体现。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在书写农牧民生活今昔巨变之时,深刻体现了新时代西藏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新面貌,展现中国最边远农牧区翻天覆

地新变化,讴歌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妇女在脱贫攻坚中的风采,也描绘了中国刺绣和蒙古族刺绣斑斓的历史,是蒙古族农牧民妇女走上脱贫路的产业扶贫史、刺绣扶贫史,更是真实、立体、饱满、深情的中国扶贫故事。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通过小切口、小事件、小人物透视大时代,舒展出一幅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魅力独具的画卷与各民族和谐共生的时代画面,也为探索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张雪云的《“海牛”号》记录了科研工作者的质朴与善良、热情与孤独、辛酸与幸福,彰显着时代气象和时代精神,更是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文学抒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现代化”“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生动而鲜活的阐释。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表现了一位英雄的一生,博大、浩荡、宽容,正如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他的初心使命在入党的那一刻就从来没有更改过,不仅彰显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家国情怀和英雄风采,也折射出党的百年奋斗史。

时代呼唤报告文学,时代需要报告文学,也对报告文学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深入采访,文学呈现和思想表达,应该是报告文学的双翼。梳理这次参评作品,我们也感受到一些不足,如有些作家采访并未深入人物灵魂的深处、事件的内核;如不少作品表现手法较为单一,形象塑造不够生动;又如思想表达的不足,让作品缺乏穿透力和思辨力。当然,任何事物总是在探索中前行,报告文学亦是如此。新时代为报告文学创作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只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创作实践,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就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能启迪心智的报告文学佳作。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宏阔之境与发现之光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作品述评

□霍俊明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获奖作品延续了抒写标志性的民族空间和标识化的地方景观的路径。他们笔下的意象、场景以及空间携带了民族记忆的根系,写作的地基也是长久而稳固的

少数民族诗人的96部诗集参评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中文作品10部,参评诗人涉及20多个民族。它们整体反映了2020年至2023年四年间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多元文化景观。这些涉及生命、文化、区域、历史、民族、宗教的诗歌带有向传统致敬的本源性特质。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区域的诗人,通过异彩纷呈的诗歌文本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成为万古星辰与大江大河。

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族裔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少数民族诗歌中被反复抒写,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这些精神向度和文化载体变得愈发重要。具体到个体主体性以及创作个性来说,每一个民族诗人又从情感、经验、语言、技艺等方面提供了差异性的多元化空间。这些充满难度与可能性的民族之诗、时代之诗、现实之诗、命运之诗为当下少数民族诗歌繁荣带来持续的活力与深刻启示。

很多少数民族诗人自觉地沿用了民族特质和文化元素,在一部分诗人那里,“诗”与“歌”比肩同在、相互融合。这些诗人站在雪山之巅、白云之下、草原之上、河流之侧、火塘之畔展开开喉歌唱,词语搭载音乐的翅膀飞翔或低缓掠过。朝鲜族诗人金荣健的诗集《鸟声啁啾冬山》在民文中最终脱颖而出,其独特的抒写方式、深沉的情感、动人的旋律反映了朝鲜族诗歌的特殊魅力,有力印证了当代民族诗人对悠久诗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再造。

此次参评作品文体多样、风格繁复,现代诗、古体诗词、散文诗共生发展,长诗、组诗与短章彼此辉映。在写作的碎片化、无方向感越来越突出的写作情势下,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总体化的视野和写作襟怀,而长诗就成为诸多诗人的选择。对于当下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而言,长诗总是能够在超大的精神体量、思想承载力、繁复结构、内在肌理、修辞技巧等方面展现厚重、深邃、大气的艺术魅力,能够在宏阔视野中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诗学的诸多命题。以布依族诗人牧之的《盘江魂》等为代表的长诗体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在融合民族、地方、历史和时代方面所做出的可贵探索。在抒情、叙事、摹写、还原、想象的合力参与下,诗人通过对“民族史诗”“梦想的书写实践,体现了对“总体性写作”诗歌美学的追求与抱负。《盘江魂》分为序诗、正文、尾声三个部分,主体分为盘江之源、盘江之魂、盘

江两岸、盘江遗韵、盘江之梦五个部分。牧之笔下的盘江是宏阔的、激荡的、高扬的、深情的、繁复的。这条江是诗人的记忆之根与生命之魂,是诗人的精神之源和血脉,是古调和心声交织的和声。北盘江、南盘江已然成为地方性知识的诗化档案,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场域。它们对应的不只是自然、地理、生态、物象、事态,更涉及对生命、故乡、祖先、族裔、原型、历史、民俗、文化以及现实新变的深沉思考与深情礼赞,“我们内心的悸动,在一场暴雨之后/把祖先们遗留的缆绳一拉/所有的痛苦不再拖泥带水/所有的回忆都布满我们无言的迷宫/而岁月的此时此刻/正在高原之巅,在盘江两岸/追赶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值得注意的是,诸少数民族诗人一次次写到了祖国大地上的河流。千百年来,河流在很多伟大文学作品中成为文明、历史、民族、故乡的化身与象征,成为流淌不息的精神母体与生命之源,成为波澜壮阔或静水深流的寓言,正如佤族诗人张伟锋所抒写的那样,“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上游的金沙江,还是在下流的澜沧江/我曾几次说起,要在夜里/在江边听一听水流的声音”(《夜色变深了》)。在诗人这里,水既是元素化的又是生命性的,既是感受性的又是想象化的,它是各种质素综合在一起的精神共同体,也是诗人保持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盘诘、对谈和深度参与的复调。水的流淌、奔涌、漫溯与精神主体性的漫游、迟疑和仁望形成了主客对应关系,其间既有对立也有融汇,既有真相也有幻象,既有现世也有彼岸,既有永恒也有瞬间,既有斑驳命运感也有时间前景的瞻望。

“大诗”“史诗”性质的文本既可以是鸿篇巨制,也可以经由诸多“小文本”最终累积、转换和提升而成,所谓积沙成塔是也。

出生于云南临沧市永德县的佤族诗人张伟锋是目前国内青年诗人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的诗歌安静、内敛、深沉、盘桓、真挚,当然也有孤独、裂变、空寂、虚幻之感,这正如他身后绵延起伏的佤山一样。永德地区山谷多样,深切高山宽谷、深切中山宽谷、深切中山窄谷、中切中山宽谷、中切中山窄谷使得佤族儿女形成了沉静多思、踏实勇毅的地方性格,“高山之上,力度相同的两场雨。一次完成/生命催生。一次完成,对野草的暗杀。我像个路人/我看见,并见证这一切”(《佤山之雨》)。在不事张扬的性格以及收放自如的文本风格中,张伟锋的诗歌充满张力与内

蕴,充满效力与活力,充满难度与可能性,充满磅礴之气与新见之力。在诗集《空山寂》中,张伟锋是一个田野考察者和坚决的返乡者。他以松弛、平静而又深入、精筒的笔调抒写出云贵边地空间的内在构造以及精神原乡机制,穿透表象对携带显豁的文化元素的地方、空间、物象予以重新发现、叩访、勘测。与此同时,佤族的诗歌文化传统在张伟锋这里得到深沉回响与有力印证,歌唱与叙事交织,外放与内敛平衡,感性智性兼顾。张伟锋的诗歌镌刻了丰富的精神肖像和地方胎记,在对现实、城市空间的观照中携带了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在对生活、情感、自我、命运、乡土、城市的深度探究与诘问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魅力与精神重力。

以那萨(藏族)《留在纸上的心》和黄芳(壮族)《落下来》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在情感、经验、智性的表达以及性别、思想、文化的观照上更为注重个性、内在化且不乏张力的静水流深式的表达。

在那萨这里,由于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她更为关注自我和生活背后那些幽微不察的命运、未知空间以及精神世界。她的诗歌总是让我们看到关于自我、生命以及万物寻求觉悟和自在的过程。由此,诗歌成为生命诗学的载体,成为特殊的精神信使。隔着世事的幕布和时间的栅栏,信使正在朝向诗人这一边走来。那萨低缓的语调、虔诚的表情,自在的内核、俯身向下的凝视以及深沉幽邃的精神空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凝恒、深思、精敏、细密、幽微的内视者,不断除执念的觉悟者,不断挣脱肉身的冥想者,不断涉渡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朝圣者。那萨诗歌中的背景、空间是主体、自然与世界融通之后的精神、元素、原型的化身。这些化身又在日常化空间、自然环境以及冥想型的深邃文化情景中对应于一个个物象、心象与幻象,对应于真实不虚的情感、经验、感受的多棱镜,对应于生命中的终极问题与未解之谜,“雪山拉下雾色帷幕,我行走其中/像一件自由漏失的器皿/天因为放空而高贵了起来”。由此,个人命运、精神情势与地方知识、民族元素完成一次次对话与融合,诗人的生命意志力和包容的襟怀也由此得到磨砺与拓展。

黄芳与其他同时代女性诗人一样,一度在文本中反复强化女性的身份、经验、意识以及文化想象,她们通过理解、“扮演”、重组、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来抵达“永恒的女性”,用文

字试探命运的深浅。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一生都是在准备、创作、修改自画像,由此诗歌分担了自白、祷辞、安慰剂和白日梦的功能。在诗人与自我、事物、空间、元素的对话、磋商、盘诘中,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在不断地回望、面对、直视、打量、凝视中,过去时的我、此刻的我以及未来的我相互交织、彼此探寻。在《落下来》这本诗集中,黄芳的诗歌已经随着“中年经验”的到来,越来越专注于日常化的生存现场,以及不容回避的围绕家族展开的死亡意识。她也总是能在细节和幽微中激活出想象的闪电与低沉的雷鸣,能够在司空见惯的表象背后上演戏剧化的灵魂舞蹈。黄芳有些诗歌不乏紧张与锐利:“那天黄昏/我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了一小行字:在风雨中/抱紧良知的骨头”。这再次验证了女性诗人天然携带的自白品质和自画像的质素。诗歌是精神能见度的产物,而从她们的写作也携带了深深的精神史的印记。

在阅读此次参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作品的过程中,从诗人与环境的深度互动来看,我们会发现当下大部分少数民族诗人仍延续了抒写标志性的民族空间和标识化的地方景观的路径。这些空间、景观作为民族的文化元素、地方胎记、族裔信仰、精神资源深入到每一位写作者的血脉和记忆之中。这一类型化写作的空间优势是显豁的,这些意象、场景以及空间也携带了民族记忆的根系,写作的地基也是长久而稳固的,写作者在无形当中也获得了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支撑。

在日常处境、地方元素、民族文化、母题意识与幽微内心、精神型构、命运主题、语言方式、修辞策略的深度对话与发现中,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闪现出异常动人的光亮。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印证了无论是宏阔的诗还是幽微的诗,它们都应该具有可贵的精神能见度和发现能力,具有发幽烛微的目光,具备打通更多人的精神共同体结构,具有将个体经验、现实经验、地方经验最终提升为民族经验、历史经验、人类经验的求真意志和写作能力。

对于所有诗人而言,他们最终一起站在了历史、文化、诗学以及现实、自我空间的复合体当中,接受读者、批评家以及时间法则审慎选择的精锐目光。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